臺大歷史學報第28期
2001年12月，頁93~126

BIBLID1012-8514(2001)28p.93-126

從妥協退讓到領土擴張：

論宋哲宗朝對夏政策的轉變及其兼容的軍事戰略

曾瑞龍*

提　要

本文檢討了宋哲宗朝對西夏的政策，特別關注其自妥協退讓到領土擴張的劇烈轉變。在傳統歷史上，元祐時期被視為兩次長期軍事衝突之間的小休，展現了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和戰略防禦的重新施行。然而宋夏之間複雜的戰略互動，令宋朝不能只管按著國內利益來界定大戰略內容。本文認為黨派政治不足以充分解釋宋代對西夏政策的轉變。相反，攻略取向其實早已根植於元祐時代政治領袖的現實主義路線。經過一連串勝利，宋人重新評估其整體作戰能力，並制訂出戰略攻勢與戰術防禦的微妙組合。宋軍在攻略天都山的勝利，標誌著持續而連貫的軍事策略，是宋廷經歷劇烈政策變更而仍能獲得成功的關鍵。

關鍵詞：宋哲宗　西夏　外交政策　軍事戰略

*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一〇六七年後的弭兵論和元祐時期的戰略防禦
三、北宋一〇九〇年代軍事戰略的轉變
四、軍事行動
五、結論

一、前言

自宋神宗（1048~1085，1067即位）在一〇八五年去世到宋徽宗（1082~1135，1101~1125在位）登基的一段宋夏關係史，在傳統的觀點曾被形容為政治路線反覆的表徵。宋哲宗（1076~1101，1086即位）即位時年紀尚幼，太皇太后高氏（1031~1093）臨朝，起用舊黨，尋求與西夏和解，並將部分神宗用兵時佔領的土地歸還。宋哲宗親政後，召回新黨，恢復向西夏用兵。[1]一〇九九年，宋軍佔據橫山和天都山，取得重大勝利。[2]以黨派政治的嬗替來了解對外關係的轉變，無疑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方向。某些戰略學界的論著，也承認國內政治對大戰略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3]無庸置疑，這種看法有其根據，也得到一些個案的支

1 有關宋哲宗對西夏的和戰，一般論著有吳天墀，《西夏史稿》增訂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二版），85~87。杜建錄，《西夏與周邊民族關係史》（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90~94。王天順編，《西夏戰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210~223。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85~96。

2 李蔚，〈宋夏橫山之爭述論〉，《民族研究》第 6 期（1987），68~76。呂卓民，〈宋夏陝北戰爭與北宋的築城〉，收入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室編，《西北歷史研究》（西安：西北大學，1989），161~184。馬力，〈宋哲宗親政時對西夏的開邊和元符新疆界的確立〉，收入鄧廣銘、漆俠編，《宋史研究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126~155。江天健，〈宋夏戰爭中對於橫山之爭奪〉，收入氏著《北宋對西夏邊防研究論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93），43~85；另收入《宋史研究集》第 24 輯（1995），177~214。

3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Stein, "Beyond Realism: The Study of Grand Strategy,"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持。黨派政治的觀點解釋了對外政策轉變的急劇性，也突顯了領導層的重要角色。若說對外關係是由國際體系、國內政治和領導層所模塑的話，黨派政治的觀點傾向以後者來解釋和戰的抉擇。可是除了黨派政治的觀點之外，也不應忽略政策長遠積漸而成的內在聯繫，及政策內容所反映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這樣對於宏觀國際秩序的觀察會較為全面，而不致流於以個人或黨派的得失作為對外政策轉變的關鍵。[4]

本文所側重討論的個案——宋哲宗朝對西夏戰略的變化，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從元祐(1086~1093)到紹聖(1094~1097)、元符(1098~1099)的對外政策轉變，體現了政潮起伏的詭譎無常，固然可以用黨派政治來解釋；但哲宗親政後改採攻勢，也並非完全是由於領導層變動那樣簡單，一直潛在的現實主義（realism）思維為這項轉變埋下伏筆。本文視現實主義為一種國際社會的規範，它在中國十一世紀末的抬頭其實和弭兵論的不徹底有關，更是元祐後期歷次成功的防禦作戰所促成。考量一下元祐時代的主和論點，便會發覺其中存在大量計算利害得失的思維。雖然舊黨的政治家每多從理想政治為出發點，但統治者實際上不能排除從國際力量對比決定政策的傾向。加上西夏和戰無常的態度令宋人對建立長遠的關係欠缺信心，宋人一旦理解到其軍事力量並不弱於西夏，他們便不再需要汲汲於求和，而經略橫山和天都山就成為一項戰略取向。

本文採用戰略觀點進行歷史個案剖析。這種觀點視戰略由大戰略（或稱為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兩個層次組成。大戰略協調內政、外交、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5]規範一個國家的對外基本態度為妥協、防禦還是攻略。[6]至於軍事戰略，則講究如何運用軍事手段達成大戰略目標，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3~21.

4 除黨派政治之外，個人背景及經歷也構成外交或戰略立場的中介變數。同屬舊黨的文彥博、蘇轍及范純仁，對應否退還城寨換取和平論點各異；同屬於新黨的章惇及曾布，對於攻取橫山及天都山後能否徹底殄滅西夏也有不同看法。這些差異表現在各人對理想政治和現實政治之間有不同程度的取捨、妥協和兼容並包的形式。此點當另文探討。

5 Liddell Hart, *Strateg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first print in 1954; New York: Praeger, 1967, second revised edition), 335~336; John M. Collins, *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 14~15.

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包含戰區戰略、戰役法、戰術和技術等不同層次對武力的使用。[7]由於對外關係是大戰略所協調的一個方面，屬於較高的戰略層次，在它下面很可能還有更基層的軍事手段與之配合。因此從戰略分析的觀點而言，觀察對外政策的轉變有沒有深層的戰略根源，是一個主要任務。

本文指出，從元祐到紹聖、元符，對外政策雖然搖擺不定，但軍事戰略卻維持一定的兼容性。不論大戰略的目標是妥協、防禦還是攻略，其下層的軍事戰略頗為穩定。在組織防禦方面，宋軍運用了彈性防禦配合據點防禦。彈性防禦本身不排除攻勢，尤其是旨在破壞敵軍集結的掃蕩作戰；[8]同時，將本來為防禦用途的堡寨變成佔領西夏領土的據點，也是將戰術上的防禦形式來進行攻略作戰。換言之，從元祐到紹聖、元符，宋軍的軍事戰略在攻守兩方面的兼容性比較大，不需要大幅度地變更軍隊的戰役和戰術機制，也可改換作戰目標。也可以說，宋哲宗親政前後對外政策的改變並不反映深層戰略結構的變動，也看不出實力對比曾經出現巨大變化，它所經歷的是一個逐步認識其軍事實力的過程。這個過程起初由不能清晰地估量軍力而傾向妥協，到逐步恢復信心而調節為緩進攻略的路線。至於黨派政治，只是加速了這項過程的完成。

二、一〇六七年後的弭兵論和元祐時期的戰略防禦

在傳統歷史上，元祐時期被視為兩次長期軍事衝突之間的小休。這時期政治軍事展現了保守主義的修正路線和戰略防禦的重新施行。一〇七〇年代的激進改革突顯了獨裁政治，結果朝廷受到官員、學者的廣泛抨擊和勸諫，引起兩極分化的黨派政治和政策波動，成為北宋晚期的政治特色。一〇八五年，宋神宗去世，太皇太后高氏攝政，她恢復了司馬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9~117.

7 Edward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9~71.

8 曾瑞龍，〈北宋對外戰爭中的彈性戰略防禦——以宋夏洪德城戰役為例〉，《史藪》第3期（1998），143~1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光（1019~1086）及其餘舊黨成員的職位。司馬光試圖摒棄絕大部分新政，但出乎意料之外，引起了不少行政方面的困難，遭到各界反對。呂公著（1017~1089）建議保留免役法，而蘇軾也批評其強硬的反新政立場。一〇八六年，司馬光死後，舊黨分裂成三個派系：由蘇軾（1036~1101）、蘇轍（1039~1112）領導的蜀派，提倡彈性政策和行政技巧；由程顥（1030~1085）、程頤（1033~1107）領導的洛派，疾呼透過恢復古代禮節來進行改制；及由劉摯（1014~1081）領導的朔派，堅持走保守路線。至於新黨成員，則流放到中國南方，其中蔡確更死於途中。他的死標誌著一輪循環報復的開始。[9]

宋神宗即位以來的對外擴張政策使得財政開支大為增加。元豐時期的宋夏戰爭已帶來沈重的社會經濟負擔，到元祐年間，新政廢除，更動搖了戰爭的經濟支柱。一〇八五年以前，宋朝在熙州、蘭州、米脂寨和安疆寨的軍事開支高達約三百六七十萬貫。光是蘭州的支出，「歲計猶須一百餘萬」。[10]蘇轍指出大部分資金來自青苗錢息、助役錢和寬剩錢。這兩項新法終止執行後，朝廷迫不得已利用坊場、河渡錢支付新疆土的經營費用，而蘇轍則傾向利用這些筆稅款雇募衙前役。[11]新領土的經濟難題在於雖則熙河和幾個新築堡寨土地肥沃，但人口稀少，沒有日常稅收。葭蘆、吳堡「二寨側近無人耕種，須籍支移。二寨若存，則遠輸終不可罷」。[12]在河東，生活在河岸腹地的人民需要將稅項轉交到葭蘆寨和吳堡。據王巖叟（1043~1093）所言，河東路指定晉州上戶將稅項轉交到葭蘆寨，絳州上戶則轉交到吳堡。從晉州到汾州三百四十里「稍通牛車」；汾州到吳堡三百六十里，從汾州到葭蘆寨三百九十里「並山路

9 劉子健，〈王安石曾布與北宋晚期官僚的類型〉，《清華學報》新刊號 2 卷 1 期（1960），109~129；另收入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117~142。

10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以下簡稱《長編》），卷375，頁9093；卷381，頁9284。

11 《長編》，卷375，頁9093~9094；另蘇轍，《欒城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37，頁515~516。

12 《長編》，卷397，頁96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險狹，澗道阻深，不通牛車。及渡黃河，尤為艱厄」。於是，每年的來回運輸里程合共約一千四百餘里。再加上運輸費用，一斗米的價錢達五百文錢，比原價五十文錢上漲十倍。[13]這難題顯示出舊黨意圖割棄新得疆土，也存在現實考慮，而且與其反對新政的立場息息相關，說明了大戰略和國內政治的密切關係。

弭兵論再次流行起來，政治經濟政策的爭議促使舊黨諸臣必須從弭兵論尋找傳統智慧，藉以抨擊對外侵略。一〇六七年後的弭兵論實際上是宋初弭兵論的延續。首先，它重申優先考慮國內利益，特別注意戰爭對社會經濟的破壞。一〇七七年，張方平（1007~1091）比較軍事野心和性慾放縱，清楚地說：「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後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心。變故百出，皆由用兵。」富弼（1004~1083）亦勸諫宋神宗要重新估量熙河之役所造成的人命傷亡，「當時殺戮人命，不可勝計，費耗財用，莫知紀極」。

其次，一〇六七年後的弭兵論貶低軍事勝利的價值。一〇八七年蘇軾在奏議上澄清了這一點，他指出任何軍事勝利若不能令到蠻夷心悅誠服，只會加深他們的仇恨，而仇恨會釀成下一輪戰爭。張方平批評中國歷史上四位皇帝：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和唐太宗。他們都縱情用兵和領土擴張，撒下社會動盪的種子。張方平總結道：「是聖人不計勝負，而深戒用兵之禍。」更進一步，一〇六七年後的弭兵論否定佔領「蠻夷」土地符合宋朝的戰略利益。蘇軾挖苦地批評新黨，曰：「今又欲取講珠城（或作嘉木卓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盛唐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14]

一〇六七年後的弭兵論越加譴責殺人是惡行，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受

13 《長編》，卷393，頁9558~9560。

14 張方平奏議，參見《長編》，卷286，頁7005。蘇軾奏議，參見蘇軾，〈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札子〉，《蘇東坡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卷28，頁591。富弼奏議，參見《長編》，卷276，頁6753~67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佛教思想所影響。據私人筆記透露，王韶（1029~1081）晚年時向僧侶讖悔自己殺戮大量吐蕃人，但卻未能得到寬恕。「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事長老祖心。一日拜而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日負債，及貴而遇債主，其債償乎？否也？』韶曰：『必還。』心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怏然不悅。未幾，疽發於腦而卒。」以上記載未必屬實，但反映出王韶的死被佛教中人理解為殺戮的報應。[15]事實上富弼亦曾透露王韶所殺的數目遠超過官方紀錄。[16]王韶子王厚（1115後卒）再舉取青唐，但他吃蘿蔔離奇猝死的記載，及其弟王棨獨犯極刑，也可能反映出某種報應觀念，「人以為韶用兵多殺之報」。[17]

不過，宋夏之間複雜的戰略互動，令到宋朝不能只管按著國內利益來界定大戰略內容。元祐時期的弭兵論者和政治家都不能擺脫這一點。儘管永樂城一役慘敗令宋神宗軍事野心明顯削弱，一〇八一至一〇八二年間的戰爭仍未能解決宋夏的宿怨。縱使功敗垂成，宋朝獲得不少土地，而西夏則僅能倖存。蘭州和附近一些堡寨扼守黃河上游地帶，威脅靈州和西夏首都——興慶府。米脂寨，葭蘆寨，義合堡，浮圖寨，吳堡和安疆寨控制橫山一些制高點和良田。一〇八三年，黨項人向蘭州展開大規模反擊，在猛烈攻勢下，一度攻陷西關。該城失守，引起短暫恐慌，幸而宋將王文郁率領七百名死士反攻，黨項軍隨即放棄包圍。[18]一〇八四年，涇原鈐轄彭孫伏擊西夏入侵軍，殺掉西夏統軍仁多零丁。[19]直到一〇九〇年為止，宋人似乎不會輸掉戰爭，可是消耗戰卻無可避免。

於是外交決策成為宋朝慎重考慮的課題。范純仁（1027~1101）率先鼓吹外交退讓，認為應「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可罷兵」。韓維則

15 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5，頁172。

16 《長編》，卷276，頁6754。

17 關於王厚之死的傳說，見洪邁，《夷堅志．丁志》（北京：中華書局標點版，1981），卷7，592。

18 脫脫等著，《宋史．夏國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486，頁14013。

19 《宋史．盧秉傳》，卷331，頁10671作仁多嵬丁；並見〈夏國傳．下〉，卷486，頁14014；《長編》，卷349，頁8377~8378；卷350，頁8381~83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蘭州等地歲費不貲，且恐怕一旦遼國介入，外交上處於被動，故指出五項理由說「地不可不棄」。[20]司馬光堅持不懈地反對用兵，避免將軍事行動升級。他草擬了一份奏議，藉以安撫黨項和恢復雙方關係。雖然避免公然批評宋神宗，但他形容前朝皇帝的拓邊政策是侵略行徑：「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因此他的「上策」是主動歸還上述侵佔地，展示新天子的仁慈和善意，期望重修舊好。假若受到黨項的軍事威脅後，才歸還侵佔地，這不單不是仁慈的表現，更是國家奇恥大辱。他的「下策」是經濟封鎖。為了實施有效而全面的制裁，司馬光構想對走私者處以嚴刑和死罪，但他恐怕條例執行時會引起社會不安，因此並不大力鼓吹。[21]約略同時，文彥博（1006~1085）強調戰爭帶來的破壞，提醒要以唐為鑑。文彥博支持司馬光，認為宋夏衝突乃前線官員、將領的野心所致。「乃知先帝本意，止務安邊，不欲輕舉，皆是邊臣希望功賞，為國生事，徼幸萬一，以致兵食困匱，財力殫耗……唐業下衰，可為商鑒。」他並徵引宦官李舜舉的話語，詳述宋神宗晚年已一改其擴張政策，而「令邊臣自固邊鄙」。所以，他除了建議宋軍歸還佔地外，還要全面撤出熙河地區。據李燾的考證，「議棄熙河者實文彥博也」。[22]

雖然元祐諸臣均反對侵略，但他們並非全部贊成外交退讓。按照蘇轍的說法，朝廷正處於一個兩難局面——保衛新領土的代價太大，而事前未經嚴竣的談判便歸還土地，卻未免是懦弱的外交姿態。「存之則耗蠹中國，為禍日深，棄之則戎人不請，無緣強與。」[23]出乎司馬光意料之外，朝廷比較喜歡「下策」，原因是宰執對於領土歸還的問題未能取得共識。蘇轍推測西夏正等待宋朝主動提出歸還土地，以增加其外交籌

20 彭百川（十三世紀初），〈哲宗棄四寨〉，《太平治蹟統類》（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卷20，頁19b~20b。

21 《司馬光奏議》，卷35，頁380~384；卷37，頁405~406；卷38，頁417~418；《宋史·夏國傳下》，卷486，頁14015；《長編》，卷365，頁8752~8754；卷366，頁8787。

22 《長編》，卷367，頁8842~8843；卷382，頁9312。

23 《長編》，卷368，頁88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碼。他引用了漢代吳楚七國之亂的史事為例，認為應該暫時忍讓，來換取時間進行備禦。他說：「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24]然而反對放棄領土者，例如安燾（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初）、穆衍（1097後卒）、孫路（十一世紀末）和游師雄（1038~1097），均堅持自己的戰略立場。他們之所以反對，基本原因是放棄領土與保證和平沒有必然的關係。放棄蘭州和這些堡寨不一定保證和平長久。失去蘭州之後，在下一次對夏戰爭中，熙河會處於不利位置。在這項議題上，舊黨對新領土缺乏認識，部分人士根據過時的情報，堅持放棄領土，故很難說服對方。文彥博在奏議上不能標列會州的位置，說「會州又未知在甚處」，並以西夏人未曾在蘭州進行過軍事建設而低估其戰略價值，認為「夏人得之已久，亦不曾築堡寨戍守，只有小小頹廢池塹，如中國荒僻村落」。[25]二十年前，當他身任知秦州時，這也許是事實。但是一〇八六年的情況便大有不同了。自從李憲（1092卒）在一〇八一年開闢道路，以備大規模軍事動員之需後，給附近堡寨拱衛著的蘭州便成為熙河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解釋了為何安燾等異議者不甚關注米脂寨和其餘堡寨的前途，只管強烈反對撤出蘭州。萬一西夏循外交途徑取回蘭州，它會在未來的戰爭中善用這個極具軍事價值的基地。[26]孫路推測失去蘭州之後熙河的不利情況，說「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蘭州棄則熙州危，熙

24 《長編》，卷382，頁9304~9305。

25 《長編》，卷381，頁9282~9284。

26 安燾的看法，參見《宋史．安燾傳》，卷328，頁10566；《長編》，卷382，頁9312。穆衍的看法，參見《長編》，卷328，頁9312；《宋史．穆衍傳》，卷332，頁10691。孫路的看法，參見《宋史．孫路傳》，卷332，頁10687~10688。游師雄的看法，參見張舜民（約1043~1110），〈游公墓誌銘〉，《畫墁集補遺》，收入《畫墁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73~80；另《宋史．游師雄傳》，卷332，頁10689；《長編》，卷382，頁9314。此外，蘇轍列出的其他戰略因素，參見《長編》，卷381，頁92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河棄則關中搖動」。[27]

總結這次爭論，終於理性、克制和妥協規範了當時的思維領域。蘇轍概括了新舊黨的意見，分析預期出現的情況，來陳述客觀意見。他批評雙方都設想得過於樂觀，忽略了最壞的情況。司馬光的建議沒有考慮到黨項人取回土地後，會干擾和平的執行；而保留所有佔領地，又可能會出現軍事失敗。比較之下，蘇轍寧願接受第一種情況，因為宋室此舉是義政，屬於可承受的政治風險。[28]范純仁也討論了三種情況：第一、將所有土地還給西夏；第二、只保留蘭州，其餘一併歸還；第三、只歸還葭蘆，米脂，浮圖和安疆寨，而保留蘭州、義合、吳堡和塞門。雖然在范純仁心目中，最後一個方案並不是合適的選擇，但朝廷還是採用它。這反映宋廷決策層的妥協態度。范粹仁還進一步建議若歸還該四座堡寨，要加上一個附帶條件，就是西夏要釋放在永樂城之役的俘虜，贖金每人絹十匹。[29]結果，宋人歸還了那四座堡寨，而西夏則釋放了約一百五十名俘虜。然而朝廷並不願意交還蘭州，這使雙方的邊界問題一直拖延數年。另外一個問題是前線犬牙交錯的可耕地，令雙方未能清楚地劃出介乎邊界堡寨之間的明確界線。由於未能圓滿解決疆界糾紛，雙方表面上恢復了和平，實際上敵對情緒仍舊存在。

除了上述的邊界問題因素外，西夏的敵對情緒和強硬姿態還源自本身的后族統治。整個十一世紀後半葉，后族攝政者壟斷了西夏的統治權，政治陰謀伴隨著不斷孕育的軍事野心。攫取兵權、建立軍功和鞏固個人權力成為循環因果。這個時期的三位西夏君主：諒祚（1047~1068）、秉常（1068~1086）和乾順（1086~1139），都在沖齡踐祚。諒祚在位十九年，其中十一年屬攝政時期；秉常在位十八年，攝政期十年；乾順在位五十五年，攝政期達十三年。根據白濱所言，這三位皇帝比較關注內

27 《長編》，卷382，頁9312。其他反對放棄蘭州者，參見《長編》，卷382，頁9319~9320；《宋史》，卷332，〈孫路傳〉、〈游師雄傳〉、〈穆衍傳〉，頁10687~10691。

28 《樂城集》，卷37，頁524~529；另見《長編》，卷381，頁9282~9283。

29 《長編》，卷382，頁9310。范純仁，《范忠宣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八集，154輯，附〈范忠宣遺文〉，頁24b~30b；以及〈范忠宣奏議〉，卷2，頁7b~13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而后族攝政者卻著重內部權力鬥爭和對外軍事行動。[30]諒祚初年，黨項王朝受沒藏家族所操縱。一〇六七年，諒祚逝世，第一個攝政時期結束。秉常和乾順時期的攝政者均來自同一個梁氏家族，它出自靈州附近的黨項民族。身為諒祚之妻，梁太后於一〇六八年攝政，並任命其弟梁乙埋為宰相。梁乙埋擢升大批家族成員，擯走元昊幼弟大將嵬名浪遇。[31]儘管秉常於一〇七六年親政，他仍受母親及叔父控制，不得不發動侵宋戰爭。一〇八一年，黨項將官李清建議西夏皇帝交出黃河南岸土地，重歸宋室。梁乙埋和梁太后隨即廢黜皇帝，重新攝政，引起宋室全面進攻。一〇八三年，梁氏家族恢復秉常皇位，以示黨項政權的合法性，並尋求宋室諒解。[32]在梁乙埋逝世（1085）以前，他提拔兒子乙逋為宰相，梁乙逋將大將仁多保忠指揮的左右廂兵分成兩軍，但加深了兩軍矛盾。同年，秉常娶了梁乙埋女兒，梁氏勢力進一步伸延到下一代。次年，秉常死去，幼兒乾順繼位。[33]下一代的梁氏兄妹開創第三個攝政時代，攫取黨項貴族的軍事權力，從一〇八五年到一〇九九年，總共突襲宋境超過五十次。梁太后親自指揮其中至少二十場戰役。[34]據宋朝情報，梁乙逋一度當眾炫耀其軍事成就，視任何妥協姿態是懦弱和膽怯行為。[35]結果，梁乙逋進一步與青唐結成姻親，對抗宋朝。

青唐與宋室的關係錯綜複雜。原來自一〇四〇年代的宋夏戰爭，吐蕃唃廝囉政權一直作為宋的盟友。然而隨著唃廝囉死後，子姪各據一

30 白濱，〈論西夏時期的后族政治〉，《中國民族史研究》第三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93），124~137。

31 沈括（1029~1093），《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卷25，248；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証》（以下簡稱《西夏書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卷23，頁270。

32 《宋史．夏國傳下》，卷486，頁14010~14011、14014。《西夏書事》，卷25，頁282~283；卷26，頁302。

33 《宋史．夏國傳下》，卷486，頁14015；《夢溪筆談》，卷25，248；《西夏書事》，卷27，頁309~312。

34 《長編》，卷409，頁9976~9977；白濱，〈論西夏時期的后族政治〉，132~133。

35 《長編》，卷467，頁11146~11147、11153；《西夏書事》，卷29，頁337~3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有被西夏逐漸吞併之勢，宋人亦加緊經略。一〇七〇年代，王韶、李憲先後在熙河地區進行拓殖，發生多次軍事衝突。到一〇八四年唃廝囉之子董氈亦告逝世，其義子及繼承人阿里骨改投西夏陣營，遂發生1087年西夏、青唐聯軍夾擊熙河路之役。是役以宋軍在洮州大捷而結束。[36]

西夏還留在戰爭舞台。一〇九二年末，武裝行動升級，西夏梁太后親自揮軍襲擊環慶路。事前，知環州章粲（1027~1102）從諜者口中得悉梁太后的計劃。他在沿邊的泉水上下毒，並派遣三個將的部隊開往敵軍側翼，堵截黨項軍隊的後方。西夏軍包圍環州四天，無功而還，途中受到洪德城附近的宋軍伏擊。宋第七將折可適（1049~1110）辨認到梁太后的旗幟，於是引兵八千直撲黨項大本營。西夏中寨頑強抵抗，俟重騎鐵鷂子開達，便猛烈攻擊洪德城，歷時數個時辰。折可適使用神臂弓和虎蹲炮作戰，造成數百名西夏士卒傷亡。當晚，折可適展開反擊，逼使黨項軍退卻到高聳山巒。千餘名西夏士卒被殺，墮崖者不計其數。梁太后放棄珍貴的帳篷，倉皇地循偏僻山徑逸去。[37]環慶路副都部署李浩派二萬兵追擊黨項後寨，可是西夏鐵騎表現英勇，李浩未竟全功。[38]和洮州之役一起，宋軍在洪德城的勝利標誌著元祐時期防禦戰略的成功。

三、北宋一〇九〇年代軍事戰略的轉變

一〇九〇年代反覆無常的政治生態帶來變化不定的對外關係。一〇九四年哲宗親政，他採取新黨章惇所主張的政策。章惇成為宰相後，便

36 有關宋與青唐關係，參見祝啟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權》（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37 《長編》，卷378，頁11384。李之儀（1108後卒），〈淮慶軍節度蔡州營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西河郡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上柱國折公墓誌銘〉（以下稱〈折可適墓誌〉），載氏著，《姑溪居士後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十集，第225~230冊，卷20，頁1~15），頁4b~5a。另章粲的詳細報告，見《長編》附注，卷479，頁11407~11409。

38 《長編》，卷479，頁11403~11406。有關洪德城之戰，參見曾瑞龍，〈北宋對外戰爭中的彈性戰略防禦——以宋夏洪德城戰役為例〉，《史藪》第3期（1998），143~1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譴責司馬光、文彥博及其餘九名官員執行放棄領土的罪責。[39]不久，另一名新黨首腦曾布獲委任為樞密使。一〇九四年，一直反對放棄蘭州的孫路當上環慶路經略使，象徵著外交政策的轉變。此外，一名議者進言主張無需理會邊界談判。次年，西夏參與邊界會議時殺死宋方代表，宋哲宗隨即終止一切邊界談判，召回代表，恢復交戰。

達成亡父遺願，或按宋時語意——「紹述」，成為宋哲宗一〇九四後外交政策的核心。年號亦改為紹聖，意云「遵照先賢之道」。在私人筆記中，宋神宗中年時受永樂城兵敗的心理影響鬱鬱而終，宋哲宗哭著從張舜民（約1034~1110）口中得知父親死因。[40]按舊黨觀點，「紹述」政治表面上讚揚孝道，實際上卻鼓勵對外擴張。安燾在派系政治中保持中立，雖然一直指摘舊黨全面撤出熙河，但也批評新黨：「自紹聖、元符以來（1098~1100），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因寵位而快恩睚，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為謀利善矣，未曾有毫髮為公家計者也。」[41]因此宋哲宗的孝道、新黨的派系利益和個別政治家例如章惇的野心，促成一〇九四年宋軍戰略攻勢的重臨。

不過，也有證據顯示一〇九四年後宋軍戰略攻勢存在理性的一面。並非所有戰略藍圖的設計者都屬於新黨的政治家。相反，不少人物政治姿態比較低調，例如安燾、穆衍、呂大忠（1096後卒）、章粢，[42]以及章粢的屬下李忠傑。著名的新黨人物曾布，也就是天都山戰役的倡議

39 《宋會要》，〈方域．十九〉，頁7617。

40 《默記》，卷中，頁20。道山先生（約十二世紀初），《道山清話》，收入《百川學海》，函10，第99冊，頁22b。

41 《宋史．安燾傳》，卷328，頁10568。

42 《宋史．章粢傳》，卷328，頁10589，描述章粢和章惇的關係「頗為世所疑」，不能明確指出他們有何親族關係。在蘇州，章粢與章惇的家族顯赫，稱為「南北章」。章粢家族遭到蔡京陷害，最後血裔中斷，見龔明之，《中吳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6，頁136、143；另見方勺，《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2，頁12。幼年時，章粢結識蘇軾，兩人交換詩文，見黃綿君，〈章粢年譜〉，載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編，《宋代文化研究》第4輯（重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189~2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所採取的是以攻為守戰略，而否定領土擴張為基本政策。更重要的是由於元祐時期的政策未能減少西夏侵略，實現和平秩序，所以朝廷基本上贊成恢復進攻。收回葭蘆等數寨一事，令黨項統治層的自傲感有增無已，而經濟封鎖又未能遏止他們的入侵。[43]連來自舊黨的蘇軾也批評朝廷沒有審慎考慮。他說：「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直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44]雖然蘇軾並不主張用兵，但宋人決意改採較長線的軍事政策，與西夏給予宋人這種和戰無常的印象不無關係。

宋朝一〇八三年於蘭州、一〇八七年於熙河和一〇九二年於環州的成功防禦，肯定了北宋的軍事力量，證明弭兵政策並無施行的必要。一〇九一年秋，西夏大規模入侵麟州和府州，激怒了鄜延路經略使范純粹（1046~1117）——儘管他是父親范仲淹防禦戰略的繼承者。他在一篇奏議寫道：「朝廷懷柔夏人，含忍至矣。而彼逆狀益甚……又臣詳看，夏國今年之內，大兵三舉，猖狂已甚。」據范純粹所言，西夏每次回覆宋朝的投訴，都承諾調查軍事衝突事件的原委，但是其態度依然未有改善。「察其設心，蓋外力不闕貢奉之名以利市販，而不廢侵寇之實也。」所以，范純粹認為不斷給予西夏和平機會，不足以停止武裝衝突。[45]

雖然西夏依然態度強硬，但明顯地它戰略上越來越變得衰弱。西夏地狹人少，不能進行長期戰爭，這成為宋朝戰略考慮中的重要因素。秦鳳路經略使呂大忠表示，黨項人在黃河南岸缺乏肥沃土地，除了橫山、天都山和馬銜山一帶，「其餘多不堪耕牧」。[46]佔領黨項土地固然不一定於宋有利，但定必嚴重影響黨項人的生計。針對舊黨「不取無用之地」

43 《宋史》，卷318，頁10589。

44 蘇軾，《蘇東坡集．奏議集》（臺北：世界書局，1965），卷4，頁439。

45 《長編》，卷466，頁11126~11127。

46 《長編》，卷466，頁111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教條，章粢明確指出，人們應視取得西夏土地為一項理性的對策，沒有必要考慮中國如何從中獲益，「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據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47]正如范百祿（1030~1094）所說，一〇九〇年代的築城戰略與以往的要地築城戰略截然不同。一〇四〇年代，范仲淹寧願依山佈防，而一〇九〇年代的經略使例如范育，卻渴望取得西夏的可耕地。這番描述並非全然正確，蓋因一〇九〇年代有不少堡寨同樣築於險要地帶，例如靈平寨和石門堡。不過范百祿的描述，總算反映了一〇九四年後不同的戰略目標。宋朝藉著在西夏土地上築起一連串堡寨，試圖奪取西夏的可耕地，削弱它的戰爭經濟基礎。

西夏人口較少是一項顯而易見的弱點。一〇四〇年代的文人戰略家田況提到「或昊賊自領十餘萬眾，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難力制」。[48]同時韓琦亦指出「誠以昊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49]與此構成鮮明對比，呂大忠並不視西夏的徵兵制度為一項戰略優勢。他寫道：「西夏每有大舉，動經累月，蓋人人自備其費。若諸路則悉從官給」，不能應討長期戰爭。同時，章粢指出：「臣竊謂羌戎為孽久矣，自慶曆以來，前後入寇，非舉國之眾，不能深入。今者自八月聚兵境上，凡四五十日，其眾始集……又惟夷狄之小邦，土地有限，人民有數，自今夏涉秋，凡舉全國之師，其眾可謂勞矣，不能無怨，其力亦已屈矣，不能無困。」[50]所以，蠶食西夏的可耕地，虛耗其人力資源，成為一〇九〇年代大戰略的最重要目標。

在新戰略之下，「堅壁清野」的傳統智慧顯得不合時宜。章粢指出「堅壁清野」的缺失在於它只能減輕宋人的損失，但未能破壞西夏的戰略資源。他形容以往的戰略「不伐姦謀，而專待其來以自全之計。」他還質疑「則賊之氣從何而沮，賊之力從何而屈哉？彼氣不沮力不屈，兩

47 《宋史・章粢傳》，卷328，頁10589。

48 《長編》，卷132，頁3130~3131。

49 《長編》，卷131，頁3098。

50 《長編》，卷466，頁11130~111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敵相持，淹以歲月」，宋軍並不能達致任何積極目標。章粲認為對方入侵時，驅民入保城寨不應成為慣例。無論是蕃漢人戶都擁有房子，牛畜及其餘資產，放棄這些東西，「一歲之間，苟至於再三，吾民亦將自困矣。」章粲以一〇八七年的涇原防禦戰為例，討論當時十一個將的兵力全部被派往防衛城寨，將野外控制權拱手讓予黨項人。結果，西夏軍掠奪方圓三百里的地區，然後安然撤退。章粲總結出「堅壁清野」一法不足以擊敗西夏，而認為「大抵戰兵在外，則守兵乃敢堅壁」。[51]野戰和守城必須嚴密配合，而不能一味從事死守。

為了在陝西戰區實現新的戰略目標，杜絕近塞二三百里範圍內的西夏的農業活動成為不可或缺的任務，[52]這項行動稱為淺攻。距離一〇九〇年代一世紀前，亦即宋遼澶戰時期，右司諫梁顥（912~1004）提出在前線重新組織騎兵。他建議挑選十位優秀將官，莫問職級高低，每人分配五千名騎兵。他們不可駐紮在城市，而只可在曠野隨其所願，攻擊敵人。梁顥聲言這個構想乃受西漢對抗匈奴的經驗所啟發，尤其是李廣（115 B.C.卒）的彪炳戰功。[53]九九八年至一〇〇四年間，隸屬田敏（十一世紀初卒）、魏能（十一世紀初卒）、張凝（十一世紀初卒）和楊延昭（957~1014）的所謂「前陣騎兵」實行了部分建議。[54]一〇四〇年代的宋夏戰爭時期，類似戰略亦以「打族」的名義下得到採用。針對黨項人剽掠前線鄉村，宋朝對沿邊黨項部落實施「打族」策略。其中功效最為昭著的是任福消滅西夏白豹城。一〇七〇年，李復圭在輾轉昇級的入侵行動中，遣將剽掠毗鄰環慶路的西夏疆域十二盤和鬧訛堡。[55]當然，即使這種措施已被視為例行公事，文人戰略家們仍爭論不休。正如田況所批評，淺攻戰略視手無寸鐵的老弱婦孺為敵人那樣殺戮，引起對方無

51 《長編》，卷466，頁11131~11132；卷469，頁11208~11209；卷470，頁11220~11223。

52 《長編》，卷466，頁11132。

53 《宋史．梁顥傳》，卷296，頁9865。

54 《長編》，卷58，頁1277；卷73，頁1662；卷151，頁3676。《宋史．梁顥傳》，卷296，頁9864~9865。

55 《長編》，卷214，頁52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窮盡的循環報復。[56]無疑，殺死沒有武裝的平民有違弭兵論的意識形態。當宋廷還囿於以有限武力實現和平的時候，報復性剽掠似乎並不是合適的戰略。

可是淺攻畢竟成為北宋晚年最重要的戰略。元祐六年（1091）九月七日，朝廷詔陝西、河東各路互相策應牽制，講求方略。秦鳳路經略使呂大忠陳三策，主張進築沒煙峽和淺井等處，也討論到攻守結合的各種可能形式。[57]同時，環慶路經略使章粢正式提出淺攻之策。[58]其後朝廷接納淺攻之策，曾下旨令各路出兵。九月二十六日，鄜延路經略使范純粹的奏報中，就提及詔旨「所務使西賊不能近邊著業，庶使疲曳厭憚，早期休息。」[59]十月六日，宋哲宗再下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常切體探西賊對境二百里內賊兵屯聚及部族所在，如有可乘，即遣謹重有謀將佐及勁勇人馬，為倏往忽歸之計，痛行討殺，及令諸路兵馬更出迭歸，使賊奔命不暇，早致困弊。」[60]淺攻戰略至此受到廣泛採用。

淺攻作為從戰略防禦到大規模開疆闢土的過渡階段戰略，具有如下幾個重要意義：首先，淺攻從理論上肯定了攻勢的價值。從宋朝立國伊始，朝臣及士大夫之間一直存在一種保境安民的主張，認為從事對外攻略會虛耗國力，導致民不聊生，如田錫認為「率義動之眾，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而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檗芽繁衍，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61]趙普的名言也代表了這種傾向：「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則何異為鼷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別有關心。」[62]根據這

56 《長編》，卷132，頁3129~3130；卷214，頁5203~5204、5220；卷216，頁5258。

57 《長編》，卷466，頁11128~11130。

58 《長編》，卷466，頁11130~11132。

59 《長編》，卷466，頁11136。

60 《長編》，卷467，頁11147。

61 《長編》，卷22，頁499。

62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6，頁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理論，攻勢既欠缺政治理據，在運作上也被認為帶有太高的風險。可是按照淺攻的倡議者的看法，在戰爭中從事攻勢是在所必行，若不破壞對方在沿邊的給養設施和經濟生態，純粹從事防守不會帶來積極結果。正如章粲所說，「此備禦之策，未足以深害之也。……謂宜乘間擣虛，擾耕踐稼，勿限其常，為淺攻之計。……諸路之師更出迭入，虜亦不能知其時，則近塞三百里之賊，既不能為生，又不能自存，彼賊不困，未之有也。」[63]總之，淺攻戰略強調了攻勢的價值，不再囿於保境安民的觀點，提倡攻守結合。即如呂大忠認為「守而常戰」是下策，但亦強調有早作預備的必要。[64]

其次，淺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戰爭昇級的表現。固然，參與一次淺攻的軍隊規模不大，也沒有意圖和對方進行決定性的會戰，因此從傳統的觀點來看，並沒有很重要的戰略意義。可是，如果改從運用暴力的尺度來衡量，則可能得出相反的看法。淺攻所打擊的不僅是軍事目標，而是對方在沿邊的經濟活動。范純粹認為「須界外三二百里路無人跡，則可以布置望候烽警之具。欲無人跡，須輕兵銳卒，淺攻近討，不時而出。」他甚至批評父親范仲淹曾經推行的招降蕃部政策認為「降人出入，將帥豈敢全然倚仗？」萬一種裔漸繁，「在昔有亂華之禍」，不如等「將來漢兵迭出，宜悉止以清久弊」。[65]因此，在以淺攻為指導思想的戰爭中，暴力的使用更為激烈。

更值得指出的是，淺攻是一項現實主義的對策，所牽涉的主要是敵我雙方的利益和實力對比，而盡量和道德價值判斷保持距離。當道德對軍事手段的約束力減弱，宋人就可以採用多樣化的戰略手段與敵周旋，而不必恪守規條。正如范純粹所說：「臣竊惟元祐以來，朝廷所以御夏人，處邊畫者，莫非以禮義為本，以恩信為先。雖彼屢肆跳梁，邊民被害，而一切容貸，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間，戍邊之卒未嘗減損，金穀之費未嘗省羨，

63 《長編》，卷466，頁11131~11132。

64 《長編》，卷466，頁11130。

65 《長編》，卷466，頁11137~11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備禦之計未嘗簡弛，彼乃愈益猖狂，邊患滋甚，固宜朝廷之改圖也。」[66]當客觀環境容許進行攻勢，對外政策轉變就可謂水到渠成。

淺攻戰略受遊牧民族的掠奪性戰爭所誘發，性質相近，然而背景有所分別。邊疆民族的剽掠反映當貿易不通時，半耕牧社會居民對消費品的需求。相反，宋朝的淺攻並不是出於經濟考慮，而是戰略互動的結果，務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打擊西夏戰略資源成為軍事目標後，淺攻的優點便受到高度評價。它不用涉及龐大的軍事力量，每次行動的傷亡人數不會很多。一〇九一年，范育建議每次行動只需動員三至五千名士兵。一〇九八年，章粢規限為五至七千名騎兵。[67]由於參與行動者全是騎兵，那就無需艱辛的後勤運輸——這是宋代計劃軍事行動的難題。零星而無規律的襲擊提高了對方預期這種軍事行動的難度，而有限度縱深的滲入及其較短的持續期間又大為減低了戰鬥風險。一〇九二年，章粢認為每次行動所需時間為五至七日，不能多於十日，「少駐軍馬，散遣騎兵討擊」，「又每至其處，發其窖藏，自可因糧而食」。[68]這套戰略十分適合一〇四〇年後的前線駐軍的結構，這時宋人已得到人數可觀的蕃兵，而對這批驍勇善戰的軍隊而言，越境剽掠，獲利非常，又符合部落傳統。一〇九一年章粢建議公平分配戰利品，藉以提高士氣。由於騷擾西夏農業活動乃最高目標，俘虜和戰利品的多寡決定一次襲擊是否成功。一〇九二年，他命令將官折可適淺攻。折可適俘虜正副首領二人，三十頭駱駝和超過三十頭牛羊，焚燒超過千頂帳篷。[69]事實上，新黨於一〇九四年回朝以前，宋廷已於一〇九一年頒行的法令授權各路經略使淺攻。在宋軍多次行動下，西夏損失的農作物和性命不計其數。[70]

道德上能否接受淺攻戰略，成為文人戰略家和政策制訂者必須考慮

66 《長編》，卷466，頁11136。

67 《長編》，卷467，頁11164~11165；卷499，頁11892~11193。

68 《長編》，卷469，頁11211。

69 《長編》，卷471，頁11244~11245。

70 詔令下達日期，參見《長編》（李燾注），卷467，頁11165。淺攻之例，參見《長編》，卷486，頁11545；卷499，頁11892~11893。《宋會要》，〈兵．八〉，頁69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課題。儘管不斷被舊黨責罵為「開邊生事」，呂惠卿仍然提醒人們，行動成敗全繫對於擒獲俘虜是否有適當的賞賜。為了削弱敵方部族的抵抗，宋朝應不應該殺掉所有族人，還是迫使他們投降？然而當軍隊進入敵界之後，此事已繫於將官的臨時決定。如果生獲敵方人戶，而所得賞賜無幾，則將來再次出兵時，宋軍便難免不願保全活口，而這樣不但使仇恨加深，也會令對方誓死抵抗。「若於陣前生降到人戶，不優為推恩，即恐他日討蕩之時，不肯全活，卻致族帳盡為讎敵，不肯歸降。」相反地，若對招降到人戶優加賞賜，有助於阻止濫殺，並且可以鼓勵官員致力招降。[71]

隨著淺攻引發出的道德和政治問題得到深入關注，戰區的整體協調也受到高度重視。一〇八四年後，路與路的協調得以改善。熙河路的設置加強了秦鳳路的安全。涇原路的隴干突出部和守軍可以用作戰略預備隊支援熙河。熙河路設置期間，涇原第六將的積極表現證明了這一點。一〇九二年，朝廷委派秦鳳路策應西夏對涇原的攻擊，秦鳳路還調派一至兩將前往熙河，以防不測。[72]一〇八六年，范純粹首創在每路設置兩個將的預備隊，隨時候命，快速應付各路的緊急情況。[73]自淺攻於一〇九二年起著戰略支配作用，范純粹強調各路一齊行動，混淆黨項人的視聽，以隱瞞宋軍的真正目標。[74]當時身兼涇原和環慶路經略使的章粢組織了兩個至三個將的高級作戰單位，並且構想將之進一步混編成一支更大共七萬餘眾的單位，「欲於鄰路不係邊面所駐之兵……併力攻討」。[75]在這樣較大的兵力集結構想之下，各路的緊密協調不可或缺。

總之，一〇九〇年代宋朝對西夏的戰略攻勢是一〇八〇年代外交談判缺乏進展之結果。宋人此際轉而著眼於削弱黨項的戰略資源——土地和人民，令進築城寨和淺攻擾耕戰略成為主調。可是，儘管皇帝要訴諸

71 《長編》，卷503，頁11973。
72 《長編》，卷477，頁11353。
73 《長編》，卷374，頁9061~9062。
74 《長編》，卷468，頁11188~11189。
75 《長編》，卷469，頁112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武力，一〇九四年開封的政治氣候仍處於舉棋不定的狀態。誠如曾布所說：「初興邊事，眾以為不可為，從官而下皆以為笑。」[76]然而時人卻忽略了，這項富於侵略性的戰略為長期所奉行的，謹慎的戰役計劃所支持。從奏議上來看，一〇九〇年代的戰役法算不上有很大的創革，反而趨向審慎、詳盡和複雜。經略使如范純粹和章粢，處事都較為小心。在他們的思考過程中，盲目樂觀和機會主義所起的作用大為減少，為宋軍的未來的軍事成就譜下新章。

四、軍事行動

從一〇九三年到一〇九五年，宋廷重新調動陝西前沿的人事任命。呂惠卿這個新黨強硬派成員當上鄜延路經略使，而孫路（1043~1161）繼承王安禮（1034~1095）任河東路經略使一職。王安禮乃王安石幼弟，但反對用兵。武將王文郁取替范純粹成為熙河路經略使，而章粢則出任涇原路經略使。開封方面，朝廷罷免韓忠彥和其餘舊黨支持者，戰時政府和戰區指揮體系重新建立。[77]

一〇九六年，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在上任的五十日內，組織了十四次小規模的出擊行動，激起黨項人全力反撲。一〇九六年末延安一役，雙方動員大量軍隊。西夏集結五十萬大軍，意圖擊潰鄜延路所有軍事力量。呂惠卿得到來自開封的增援，將部隊改組為二十二個軍。他保留一半部隊在延州城內——當時延州改稱延安府，其餘部隊則駐紮在延安府附近。黨項人沿烏延口翻越橫山，分成三個縱隊，東路威脅青澗城，中路包圍塞門寨、龍安寨和金明寨。西路方面，黨項人組織迅速而大縱深的突擊行動，一日之間，由邊境順寧寨通過安遠寨，殺進距延安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偵察到宋軍的頻密調動，西夏軍築起十一座堡寨對付十一路宋軍。在延安府中，經略使呂惠卿親自指揮一切調動事宜，協調各路

76 《長編》，卷510，頁12144。

77 《宋史》，卷322，頁10687~106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由於無法在短短數天的包圍戰中攻下延安，考慮到會有被呂惠卿切斷歸路的潛在危險，又不能再往南面掠奪宋土，結果西夏軍轉移到金明寨。經過兩天的包圍，西夏軍攻陷金明寨，消滅宋二千八百名守軍，只有五人倖存。西夏軍隨後撤退，呂惠卿派部隊追截，但給龍安城附近的黨項騎兵擊退。是場戰役以西夏的戰術勝利結束。然而，動員五十萬人，只殺死少於三千名宋軍，戰果無疑微不足道。[78]

與此同時，宋朝熙河路經略司著手構築女遮谷的防禦工事，保護貫通通遠軍到蘭州的唯一路線。早於一〇九五年，宋哲宗便下令在這個以前西夏駐軍的地點建築堡寨。[79]正當西夏集中兵力攻擊鄜延路時，熙河路經略使便趁機在這座山谷築起堡寨，伸展熙河邊界的右翼。同時，一支涇原部隊突襲沒煙峽的西夏堡寨，奪取通往天都山的要途。

黨項人入侵鄜延無功而退後，宋涇原經略使章粢加快展開葫蘆河攻略，兵臨天都山。葫蘆河是黃河支流，其河谷是傳統絲路，由唐朝內陸城市道往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石門口位於宋朝邊界四十里外，是天都山的大門，西夏稱之為「唱歌作樂地」。[80]在天都山的南牟會，有一座西夏宮殿，附近是西夏軍點集之處，還有一片鹽湖。[81]從一〇九七年到一〇九八年，雙方為了控制這塊土地而艱苦角力。

一〇九七年初，涇原經略使章粢準備好築城材料，要求其餘各路佯攻，分散西夏軍注意力。呂惠卿於是命令一名將官劫掠橫山上的洪州。孫路則派遣部隊短暫佔領鹽州。同時，熙河路經略使鍾傳（約1105卒）拓展蘭州外圍，在黃河北岸建築金城關，威脅西夏的右廂兵。[82]儘管宋軍多番努力，西夏結果仍然動員了十二個監軍司中的其中六個，分別為

78 《宋會要》，〈兵・八〉，頁6889；〈兵・二八〉，頁7274~7276。《宋史・呂惠卿傳》，卷471，頁13708；卷486，頁14016。木塞，〈綏德李夫人墓志與宋夏延安之戰〉，《考古與文物》第4期（1987），54-55。

79 《長編》，卷510，頁12144。

80 《長編》，卷485，頁11522~27；卷486，頁11545~28；卷488，頁11586~11589。《宋史・章粢傳》，卷328，頁10589~10590。

81 《泊宅編》，卷3，頁15。

82 《長編》，卷485，頁11586~11589；卷486，頁11545~115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甘州、右廂、卓羅、韋州、中寨和天都山，全歸名將妹勒都逋（1099後卒）統率，對付宋軍涇原的作戰單位。[83]兩軍在近石門口的地方交戰。戰前，章粢獲得熙河、環慶和秦鳳路的支援。熙河將姚雄擊潰一個西夏部隊，斬首三千，俘虜三萬餘。[84]可是，折可適在沒煙峽追擊西夏軍隊途中損失二千名熙河士兵。[85]有別於永樂城之慘敗，宋軍在建築石門城和好水河的二十二天工程中，能進一步控制附近有利地帶。竣工後，這兩座城名為平夏城和靈平寨，[86]隱含消滅西夏王朝之意。

平夏城的竣工標誌著一連串宋軍攻擊的開始。由於西夏軍的敗退，宋陝西五路收復自一〇八五年後失去的堡寨，並在西夏境內構築一系列防禦工事。河東於一〇九六年初取回葭蘆寨，於一〇九八年在該寨西北二十里築起神泉寨。三交堡落成後，與上述兩寨在那裏形成一度三角防線。[87]

鄜延路也鞏固無定河和大理河的防衛，佔領橫山東部的戰略地帶。一〇九七年初，呂惠卿加強烏延口的防衛，此乃沈括、种諤於一〇八二年進築橫山時選定的原址，也是兩年前黨項人入侵延安的要途。當西夏主力在石門口與涇原部隊交戰時，呂惠卿把握戰略時機，趕快築成浮圖寨。浮圖寨和其餘兩座於大理河的堡寨竣工後，宋軍便控制了無定河和大理河的分水嶺。是年秋，呂惠卿在烏延口以外築起另一座堡寨，以威脅西夏人的農耕地。翌年，呂惠卿發動大規模進攻，命令王愍越境攻擊。基於西夏人的抵抗大為削弱，宋軍士氣高昂。呂惠卿分別委派第六將築米脂寨；第二、四將築開光寨；另外三個將，第三、五和七將則掩護進

83 《宋會要》，〈兵・八〉，頁6889。

84 《宋史・姚雄傳》，卷349，頁11059~11060。

85 〈折可適墓誌〉，頁5b~6a。《宋史・折可適傳》，卷253，頁8867，記載是次僅損失一千兵。

86 《長編》，卷486，頁11522~11527；〈折可適墓誌〉，頁5a~b；《宋史》，卷253，頁8867；卷328，頁10589~10590。《宋會要》，〈方域・十九〉，頁7614，誤將此事標於一〇八一年。

87 畢仲游（1045~1119），〈朝請大夫孫公墓誌銘〉，《西臺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別輯，第288~291冊，卷13，頁9a~10b。《長編》，卷495，頁11770；卷497，頁11820、11832；卷502，頁11959。《宋會要》，〈兵・八〉，頁6889~68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築那娘。他保證給予廂軍、保甲以及民伕額外薪金、津貼和獎賞，令每項工程得以於五、六日間火速完成。[88]結果鄜延路總共完成九座堡寨，修直連接麟府路的邊界。某些工程如烏延口、開光嶺和浮圖寨，曾經是以前种諤規劃進築之處。換句話說，四分之一世紀之前，种諤在囉兀戰役（1070~1071）的任務，現由呂惠卿完成。

環慶路則取得白馬川往靈州的據點，築起興平城，作為攻擊西夏韋州監軍司的踏腳石。同時，孫路下令在山巒高地築起橫山城。工事完成後，黨項部落漸次投降。於是，孫路只需動員廂軍和保甲便可，不用徵集民兵或雇募民夫。[89]

涇原路在平夏城近郊築起四座城，全面控制石門城和葫蘆河西岸。接著，章粢在那裏駐紮第十一將，保護這個突出部。他又推薦其手下能幹的將領郭成（1046~1102）擔任那裏的指揮官。[90]其後，章粢下令部隊推進六十里，在沒煙峽的進出口築起兩座堡寨，堵塞西夏從天都山入侵的路線。據曾布說，沒煙峽以外的曠野有多條小路，黨項騎兵就是沿此進行突襲。為了解決安全問題，章粢編成第十二將，提拔愛將折可適為將官。[91]避免在不利的條件下與宋軍決戰，西夏人陸續將軍隊及部落遷移往內陸。

在熙河前線，鍾傳保持積極的姿態，加強蘭州及其近郊的防線，從西南逐漸逼近天都山。一〇九七年夏，鍾傳在青石峽築城。這一條要道掩護著熙河的補給線，並逕抵西夏剌子山監軍司。一〇九八年初，鍾傳

88 《長編》，卷491，頁11659；卷492，頁11680~11683；卷494，頁11730~11731；卷497，頁11816、11818~11819。

89 《長編》，卷489，頁11603；卷495，頁11771~11773。另見〈曾鞏日錄〉，收入《長編》，卷497，頁11817。

90 王之望，〈故客省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第十一將郭公行狀〉（以下簡稱〈郭成行狀〉），《漢濱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別輯，第326冊，卷15，頁16~23），頁17a；《宋史．郭成傳》，卷350，頁11085；《長編》，卷499，頁11894。

91 《長編》，卷497，頁11817；卷499，頁11894；卷501，頁11938。《宋史．折可適傳》，卷253，頁8867。〈折可適墓誌〉，頁6a~b，記其官名為第十三將，這可能是《四庫全書》傳抄之誤，蓋直至1098年，只有十二個將隸屬涇原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進一步完成會寧關的工事，宋境亦得以向東擴展，穿越天都山，接連平夏城。[92]

和永樂城之戰一樣，西夏軍把反擊矛頭對準最要害的城堡——平夏城。一〇九八年夏，宋樞密院收到環慶路關於黨項人大舉動員的報告。在徹夜的討論中，曾布勸諭章惇下令前線戒備。[93]這分報告證實了之前一名降宋西夏官員的口供，聲言西夏不會集中「實袞都宗托卜德」，意謂包圍及攻擊城寨。相反，這降官透露西夏會滲透和剽掠近郊地區。[94]樞密院不予輕信，發表了劃一指揮七項，強調彈性防禦和各路之間的協調。這分文件還包括訓練、紀律、計劃、後勤和工事等九項「檢舉指揮」。[95]隨著軍事衝突的危險狀況漸次升級，宋人加快防守準備。西夏表面上拜託回鶻使節團轉達和平意願，但宋廷考慮到並不清楚黨項人的真正打算，對外交斡旋所起的作用沒有寄予厚望。[96]初冬，樞密院收到涇原另一份報告，據一名逃俘所說，一支龐大驚人的西夏軍隊，為數多達一百五十萬，在天都山以北安營，距離沒煙峽宋軍堡寨僅五十里。其後，有報告指這支軍隊沿涇原邊界推進超過十天，動向未明。正當樞密院衡量黨項突然轉換攻擊目標的可能性，西夏軍向平夏城展開空前猛烈的攻勢。[97]

西夏進行第二次平夏之役，是一場組織完善的戰役。一如以往，他們在戰爭中表現出靈活性和高度智慧。梁太后挾著小皇帝乾順親自指揮是次戰役，聲稱動員超過百萬大軍，實際上只是稍多於三十萬，向沒煙峽推進。[98]縱使動員如此龐大的軍事力量，黨項人直到最後關頭仍小心

92 《長編》，卷489，頁11604、11607。

93 《長編》，卷500，頁11915。

94 《長編》，卷500，頁11899。據中華標點本，此段標成：「仍云更不與實，袞都宗托卜德，言不攻城塞也。」文中「袞都宗托卜德」是指「不襲擊城市」還是某人稱謂，並不清楚。馬力，〈宋哲宗親政時對西夏的開邊和元符新疆界的確立〉，139，標作「實袞都宗托卜德」。

95 《長編》，卷500，頁11901~11905。

96 《長編》，卷500，頁11925。

97 〈曾布日錄〉，《長編》，卷503，頁11976；《長編》，卷503，頁11975~11976。

98 〈曾布日錄〉，《長編》，卷503，頁11983~11984；《長編》，卷503，頁11975~119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隱瞞作戰目標。戰前，梁太后及眾將一起標繪平夏城的位置，認為「平夏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若果西夏攻佔平夏城，則其餘堡寨的抵抗會相繼瓦解。[99]為達成如斯重任，六路統軍嵬名阿埋（1099後卒）負責包圍平夏城，西壽監軍司妹勒都逋則率領攔截部隊對付宋朝援軍。據蕃將李阿雅布說，這兩名西夏監軍非常勇悍、能幹和精明。[100]在他們的指揮下，西夏軍隊同時包圍六座新近建成的宋軍堡寨，四座在平夏城附近，其餘兩座在沒煙峽，日夜努力不懈地攻擊平夏城。在十三天的包圍中，西夏運用了不同戰術，包括挖地道、衝輣和樓車。[101]

然而，宋朝的彈性防禦戰略足以抵銷黨項的攻擊。宋陝西前沿守軍的左右翼即時回應。河東路深入西夏反擊，熙河路副經略使王愍則攻擊卓羅監軍司和右廂監軍司，共殺死一千三百名士兵，俘獲二萬四千頭牛隻。他亦焚燒方圓七百里以內的農舍和倉庫。[102]在獲悉平夏之圍以前，樞密院已命令環慶路派遣一萬軍，內含三千騎，開往涇原，作為戰略預備隊，由种諤之子，將官种朴率領。同時，秦鳳路也派遣了數量與之相當的軍隊。[103]確定黨項的目標是平夏城後，開封催促環慶和秦鳳路給予更多支援。一支由副都部署王恩統領的諸路聯軍在涇原登場，向平夏城進發。由於雙方都全面動員，一場決定性戰役已無可避免。

宋軍前沿第十一和十二將只得二萬人，在郭成和折可適的領導下頑強抵抗。他們在城牆上用神臂弓射擊和在夜間擾敵。[104]據王之望所載，當平夏城處於危急存亡之際，郭祖德——涇原路的軍官，也是郭成的義兄——建議不顧任何代價以解平夏之圍。副都部署王恩和將官姚雄、姚

《宋史．章楶傳》，卷328，頁10590。

99 〈郭成行狀〉，頁17a~b；《長編》，卷503，頁11974~11976、11983~11984；《宋史．郭成傳》，卷350，頁11085。

100 《長編》，卷504，頁12017。另《宋史．折可適傳》，卷253，頁8867；卷328，頁10590。

101 〈郭成行狀〉，頁17b；《宋史．章楶傳》，卷328，頁10590。

102 《長編》，卷503，頁11984、11987。

103 〈郭成行狀〉，頁18a；《長編》，卷503，頁11984、卷504，頁12000。

104 〈郭成行狀〉，頁17b~18a；《長編》，卷503，頁11984、卷504，頁1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1126後卒）都一致贊成，但种朴提議延遲反擊。他要求郭祖德偵察敵方兵力，並向在場所有人詳細地解釋：「夫嬰孤城抗劇賊，所持以堅士心者，援兵矣。今吾眾寡不敵，戰而勝，圍未必解。不幸小挫，賊驅所獲示城中，則士卒解體，誰與守者？且郭公在，城何憂？」[105]

正如种朴所預測，郭成和城內第十一將四至五千名士兵，造成西夏軍大量傷亡。隨著天氣漸漸轉壞，某一晚，黨項的樓車遭到強風摧毀。加上西夏軍隊的口糧已消耗殆盡，看到軍隊陷於恐慌和無秩序狀態，梁太后痛哭不已，全軍在子夜時分撤退。正當西夏軍士氣下降，宋朝將官姚雄和姚古展開反擊，派一支伏兵重創敵軍。[106]後來人們問及這個成功的防禦有何心得時，郭成表示他唯一憂慮是救援部隊可能過早到來。[107]种朴和郭成之言解釋了章粲的防禦戰術原則：「大抵戰兵在外，則守兵乃敢堅壁。」[108]

西夏軍撤退不久，經略使章粲下令第十一和十二將以騎兵展開快速反擊，並增援郭成和折可適騎兵一萬。郭、折將部隊分成六個縱隊，滲入天都山。受到之前章粲四度越境淺攻所欺騙，西夏六路統軍嵬名阿埋及西壽監軍妹勒都逋並未預期到宋軍騎兵竟然深入攻擊。郭、折二將突然殺到，令正在舉行獵後宴會的兩位西夏監軍束手就擒，「俘馘三千餘，獲牛羊不啻十萬」。[109]同時，宋軍蕃將李忠傑也組織騎兵滲入剽子山，襲擊卓羅監軍司的大本營。統軍仁多保忠（1140後卒）僅以身免。[110]對

105 〈郭成行狀〉，頁 18a~19a；《長編》，卷 504，頁 12000。另《宋史．王恩傳》，卷 350，頁 11088，認為類似意見屬於王恩，可能出於他是全軍總指揮之故。

106 《長編》，卷 503，頁 11983~11984；卷 1503，頁 11983；卷 504，頁 12011。《宋史》，卷 349，頁 11059~11060；卷 350，頁 11088。

107 〈郭成行狀〉，頁 19a。

108 《長編》，卷 466，頁 11131~11132；卷 469，頁 11208~11209；卷 470，頁 11219~11223。

109 〈郭成行狀〉，頁 19a~b；〈折可適墓誌〉，頁 6b；〈曾布日錄〉，收入《長編》，卷 504，頁 12017~12018；《宋史．折可適傳》，卷 253，頁 8867；〈章粲傳〉，卷 328，頁 10509；〈郭成傳〉，卷 350，頁 11085；〈夏國傳下〉，卷 486，頁 14018。《長編》，卷 503，頁 11976；卷 504，頁 12017；卷 505，頁 12032~12033；卷 505，頁 12038。

110 〈曾布日錄〉，轉引自《長編》，卷 504，頁 12018。關於仁多保忠的帥府，見《長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是次輝煌勝利，宋哲宗心滿意足，接受百官祝賀，並厚賞曾布，經略使章粢以及兩位將官。郭成罕有地晉升為雄州防禦使、折可適為洺州防禦使。[111]此外，宋哲宗命令章粢將這兩名西夏將領套上枷鎖，用囚車送往開封。章粢以兩人具情報價值，懇求皇恩大赦，收歸旗下。[112]

宋朝的軍事勝利帶來國際回響，西夏三度請求契丹軍事介入。[113]不久，遼國使者抵達開封，促請即時停戰。隨著形勢轉變，大遼干預宋夏戰爭的潛在動機表面化起來，蓋因宋朝滅掉西夏並不符合契丹的戰略利益。進行正式調停之前，遼使透露這次斡旋乃鑑於西夏的危急情況，要求和解。遼廷有關決策過程沒有清楚記錄，但據一些零星資料顯示，似乎是一個三重政策。第一、遼國似乎為促使和平實現，密謀對付西夏強硬派。據宋人諜報，遼道宗（1032~1101）不單拒絕西夏軍事介入的要求，還派使者毒死被視為好戰成癖的戰爭發動者梁太后。[114]結果，乾順恢復親政，主導和平談判。第二、遼國催促宋朝放棄並歸還所有佔領土地、堡寨和州軍予西夏，「休退兵馬，還復疆土」，[115]以突出大遼在兩國之上的優越地位。第三、契丹皇帝似乎運用了武裝規勸政策。他在近宋境代州的地方巡狩。宋朝情報指遼營距雁門關以北只有五至七里。[116]

針對這樣的形勢，開封存在兩派意見。宰相章惇建議不用理會契丹的調停，無論是戰爭抑或和平，應由宋朝決定。「夏國作過未已，北使雖來勸和，亦須討伐。若能服罪聽命，雖北朝不來勸和，亦自當聽許。」樞密使曾布和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則認為宋朝應著眼於從西夏身上得

卷 503，頁 11977。

111 《長編》，卷 504，頁 12016~12017；卷 505，頁 12038。《宋史．折可適傳》，卷 253，頁 8867；〈郭成傳〉，卷 350，頁 11085；〈郭成行狀〉，頁 19b；〈折可適墓誌〉，頁 7a。

112 《長編》，卷 505，頁 12026；卷 506，頁 12061。

113 《遼史》，卷 115，頁 1528。

114 〈呂惠卿家傳〉，引自《長編》，卷 508，頁 12102~12103 附注。《西夏書事》，卷 31，頁 351；馬力，〈宋哲宗親政時對西夏的開邊和元符新疆界的確立〉，141。

115 《長編》，卷 509，頁 12116~12117。

116 《長編》，卷 509，頁 12119；卷 515，頁 122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實際利益，不應進一步破壞宋遼關係。[117]伊始，章惇的建議似乎較具影響力。經過哲宗與章惇、曾布及其餘高級官員的廣泛討論，朝廷修正立場，開封允許國書附上有利遼國的一段：「夏國罪惡深重，雖遣使謝罪，未當開納。以北朝遣使勸和之故，令邊臣與之商量，若至誠服罪聽命，相度許以自新。」[118]然而，宋人澄清遼夏關係有別於宋夏關係，堅持宋是西夏的宗主國。誠如國書所述，遼和西夏是父與子婿的關係，宋和西夏則是統治者與子民的關係。宋朝懲罰子民並不意味著與遼國對立。而且，國書宣稱所有西夏土地都是由宋太宗和宋真宗授予李繼遷的中國領土。所以，如果西夏不打算投降，中國仍保留收回統治權的最終權力。詔書指出夏人反覆無常的態度，「一面修貢，一面犯邊」。更重要的是，國書道出戰爭作為懲戒手段，並非宋朝所創。相反，遼興宗曾明確地用以對付西夏侵略，「元昊縱其凶黨，擾我親鄰，屬友愛之攸深，在蕩平之亦可」，而宋朝只不過仿傚前者。最後，國書承諾談判。[119]在逗留開封三十五天之後，遼國使者接受國書而回。同時，宋朝促請西夏呈上謝罪書和交還兩名戰犯珪布默瑪和凌吉訛裕，作為換取和平的必要條件。[120]在西夏未履行這些要求之前，宋軍加快進行橫山和天都山的防禦工事。

正當西夏兵敗平夏城，宋朝全面佔據橫山和天都山。在戰線東翼，鄜延路建築暖泉寨，距離米脂寨東北四十五里。同時，河東路在黃河西岸建置了四座堡寨，加強對橫山東麓的控制。一〇九九年夏，宋朝動員超過十萬大軍，十天之內築成另外八座堡寨。結果，鄜延、河東和麟府連成一道新防線，沿橫山綿延超過三百里，將黨項驅趕到沙漠地帶。為鞏固對新佔領地的控制，宋朝在葭蘆寨設立晉寧軍。[121]此外，環慶路經

117 《長編》，卷 508，頁 12103~12104；卷 509，頁 12116~12118。

118 《長編》，卷 509，頁 12116~12117。

119 《長編》，卷 509，頁 12113~12118。《西夏書事》，卷 31，頁 352~353。

120 《長編》，卷 508，頁 12102~12105。《西夏書事》，卷 31，頁 353~354。

121 〈朝請大夫孫公墓誌銘〉，頁 13b~14a。《長編》，卷 506，頁 12058、12062；卷 507，頁 12075；卷 508，頁 12106~12107；卷 509，頁 12124~12125；卷 511，頁 12160、12168~12169；卷 514，頁 12216、12224~122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略使在橫山興建三座重要堡寨，另在沙漠邊緣，距離前西夏韋州監軍司僅十里的地方築了一寨。[122]值得注意的是，宋朝佔據原屬白豹城和金湯城控制的地帶，這兩座堡寨牢牢地楔入鄜延和環慶之間。完成兩座堡寨的工事後，朝廷決定沿用其名，以為紀念一〇四一年范仲淹關於收復該兩座堡寨的初步構想，首次揭開了宋夏爭奪橫山的序幕。[123]

同時，涇原路擴張邊面，由平夏城以北，伸延到西夏行宮南牟會的原址，設立天都山的指揮部——西安州。西安州距熙河路通會堡僅五十里，邊面連接，而西夏天都山監軍司自此失去了所據的地盤。據方勺和韓淲（1159~1224）說，佔領附近的鹽池以後，宋朝每月出產的鹽值十四萬錢，足以應付熙河路部分地區的支出。[124]一〇九九年秋，涇原和熙河路完成會州及其餘三座堡寨的工事，重新確認從蘭州經黃河到會州，再沿天都山北巒穿過沒煙峽，最後抵達平夏城的領土。[125]一〇九九年秋，西夏遣使謝罪，其謝表用詞謙卑。[126]一〇九九年底，雙方終於重歸和平，宋夏新疆界確立。[127]《宋史》著者評說：「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為之寢兵。（章）粲立邊功，為西方最」，[128]足以標誌著宋哲宗一朝在外交和軍事上的成就。

---

122 《長編》，卷 506，頁 12060；卷 510，頁 12125~12126；卷 511，頁 12168；卷 508，頁 12105；卷 509，頁 12123；卷 573，頁 12199；卷 513，頁 12201；卷 514，頁 12216。

123 《長編》，卷 508，頁 12110；卷 511，頁 12155、12170；卷 512，頁 12186。

124 《泊宅編》，卷 3，頁 15。韓淲（1159~1224），《澗泉日記》，與陳鵠（十二世紀末），《西堂集耆舊續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1993），卷 6，頁 46~47。

125 關於這項計劃，參見《長編》，卷 504，頁 12006~12015；卷 505，頁 12034~12036；卷 506，頁 12061~12062；卷 508，頁 12095~12100。關於軍事行動，參見《長編》，卷 508，頁 12108~12110；卷 509，頁 12123；卷 510，頁 12126~12127；卷 511，頁 12160、12163~12164、12167~12168；卷 512，頁 12187；卷 513，頁 12203~12204；卷 514，頁 12208、12216、12220。

126 《長編》，卷 515，頁 12234、12240。

127 《宋史》，卷 486，頁 14018；《長編》，卷 519，頁 12343~12344；《西夏書事》，卷 31，頁 355~356。

128 《宋史》，卷 328，頁 105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過數年的積極攻略，財政支出巨大和民力疲弊又再度成為核心問題。早在一〇九二年，章粢即看到「民苦於轉餉，而關陝虛竭，兵疲於征討，而亡逸自如。傾天下之財，委於一路，如填溝壑，而賊氣不少衰者何耶？蓋先勞其眾，不恤其本。」[129]在一〇九八年一次御前會議上，宋哲宗「屢顧執政曰：『民力已困。』眾皆曰然。布曰：『何止民力，公家之力且無以為繼矣。』」按照現實主義的思維方式，曾布認為是否消滅西夏，要看敵我勢力消長的情況而定。他說：「邊事累年未了，今涇原已逼天都，勢不可已。然今秋見西賊舉動，即可以知其強弱，若果困敝，有可以滅亡之理，亦須年歲間便為殄滅之計。若西人未有殄滅之勢，年歲間未可殄滅，亦須隨而收斂，休兵息民，以圖安靜。」他看到與西夏有劃黃河為界的可能，但不堅持，終歸主張取得橫山、天都之後就主動轉入防禦。當然，新黨中也有漠視社會經濟因素，力主繼續用兵消滅西夏的大臣，如章惇就是一例。他反對曾布的意見，說「曾布言臣欲取興、靈，是害心風。」可是他的主張並沒有得到採納。[130]雖然如此，章惇和曾布的分歧，突顯了開疆拓土的政策一旦不再考慮社會經濟因素時，有最終違背現實主義的可能性。開疆拓土政策和現實主義的兼容性畢竟是有限的。當對外政策過度保守時，現實主義的思維方式傾向支持一定程度的積極攻略；但當開疆拓土構成社會經濟負擔，現實的當政者就應該根據客觀條件調節策略。以上曾布的言論，基本上維持了現實主義的立場。然而到徽宗即位，召蔡京回朝，逐去曾布，並再次挑起對西夏和青唐的戰爭，宋人的對外政策就似乎開始背離現實主義，也響起了國家安全的警號。

五、結論

從元祐到紹聖、元符，北宋朝廷的對外政策經歷了從退讓妥協到軍事擴張的過程。然而自戰略分析的角度來看，這只是一個表層現象。誠

129 《長編》，卷 469，頁 11210。

130 《長編》，卷 500，頁 11911~119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元祐時代大部分主政者都堅持主和的論調，但深入來看，其主和的理論依據頗為駁雜。司馬光是較多地傾向理想政治的一位，[131]強調儒家以仁義為本的道德理據；但是蘇轍等政論家主要是從勢力平衡的角度來理解，而得出主和的結論。即以退還城寨一事來看，朝廷始終沒有辨明和平的取向是建基於理想政治還是現實政治的構想，對於退還城寨的數量問題也只是採取折衷了事的態度。當政者始終不能否定蘭州具有至高的戰略價值，無論道德理據有多強，結果還是否定了將它退還西夏，就說明了元祐的主和路線不能排除現實主義的影響。可是現實主義的主和路線，基本假設是軍事實力不足，而事實上經過了蘭州之圍、洮州之役和洪德城之役後，宋軍穩定的作戰表現已經得到肯定，而求和已不再是唯一的出路。這標誌著政策轉變的契機，基本上是一項現實政治的考慮，而黨派政治只是加速了這項變化。

宋哲宗朝從對西夏妥協到積極攻略，在大戰略而言是一個極端的劇變。可是從軍事戰略角度來看，這項轉變並沒有增加太多實質的內容。宋軍在進攻的同時保留了很多防禦的手段——或許說進築城寨，諸路協同牽制等大部分進攻的手段，是從防禦作戰引申而來的更為正確。處於反攻階段的宋軍，其戰役法和戰術手段相當地保持了與之前進行防禦期間的連貫性。這令他們在平夏城戰役遭遇敵軍大規模反撲時，能夠順利

131 國際政治學者一般認為現實政治與理想政治的分野繫乎於是否承認規範（norm）對行為的約束力。現實主義者視國際社會為一無政府秩序（anarchy），國家為爭取或維持其利益，乃因應其實力多寡而調整策略。相反，理想政治的倡議者則認為除利益之外，另有一些價值值得爭取，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必須遵守一些合乎該價值觀的規範。有關理論，參見 Peter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2;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Katzenstein ed., *Ibid,* 33~75. 本文將司馬光定性為「較多地傾向理想政治」，是由於他主張國家的行為必須合乎道義，「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朝廷如果首先做出一些不義的事情，則再難以約束他邦。當然，他也考慮到經濟和軍事力量不足等現實問題，但無礙於他採理想政治的基本立場。有關言論見《司馬光奏議》，卷 35，頁 380~384，〈論西夏札子〉；卷 38，頁 417~418，〈論西人請地乞不拒絕札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進入防禦，透過一個彈性手段擊敗對手。這項成功提示了宋哲宗朝對外政策的激烈轉變，其實是透過軍事戰略的相對兼容性來完成的。主和論包容了現實主義思維，而武力擴張政策背後是穩健的軍事策略——改弦易轍並不意味著摒棄傳統的智慧。以上可以說是宋哲宗一朝政策經過反覆激盪，而終於取得對外戰爭勝利的原因。相反，南宋以打擊武將來求和，以軍事冒險來求戰的表現，實在可以說是瞠乎其後了。

（責任編輯：吳雅婷　校對：邱鐘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om Accommodation to Territorial Expans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ng Zhe-zong's Xi Xia Policy and Its Compatible Military Strategy

Shui-Lung Ts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Xi Xia policy of the reign of Song Zhe-zong and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preference from accommodation to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 conventional history, the Yuan-you era was known as a short respite between two periods of bloodshed, which saw the revision of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nd reinstatement of defensive strategy. However, the nascent complexity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Song and Xi Xia prevented Kaifeng from defining its grand strategy simply because of domestic interes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actional politics is not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change of Song China's Xi Xia policy. Rather, the aggressive preference of Kaifeng was rooted in the realist approach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during the Yuan-you period. As a result of a series of victories, the Sung reevaluated its military capacity and capability and formulated a sophisticated combination of strategic initiative and tactical defense. The triumph of the Song Tian-du Mountain campaign suggests the continual and sustainable military efforts a key of success despite the radical change of foreign policy.

Keywords: Song Zhe-zong, Xi Xia, foreign policy, military strateg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